

回顾与展望:开创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新局面*

方明 王頔

十年前,拨乱反正使中国的社会学开始了重建的过程。十年中,社会学以后来居上的姿态蓬勃发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今天,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更对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创中国社会学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是值得每一个社会学工作者认真思考的问题。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面临的任务和肩负的使命,可以使我们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我国社会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历史回顾:社会学健康成长的十年

1978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把中国推向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拨乱反正基础上推进的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使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着深刻而又急剧的变革。

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的。

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有着独特的历史轨迹。十九世纪末,在中华民族的命运受到严峻的挑战之际,诞生于西方的社会学传入了中国。不少学者怀着向西方寻求“济世良方”的希望,试图通过社会学的传播和发展对改变中国的现实有所作为。然而,严酷的社会历史环境形成的种种制约,使这种希望难以实现。新中国诞生后,我国一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学家曾努力想使社会学在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是自50年代后期起,“左”的影响和认识上的误区导出了否定社会学的结论,1952年的院系调整和1957年关于社会学的讨论,使社会学戴着“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消声匿迹了。

谬误的澄清、思想的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使社会学结束了建国后近三十年的厄运和磨难,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1979年3月15日至18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召开座谈会,探讨社会学的发展问题。在座谈会上,胡乔木同志代表党中央为社会学这门学科恢复了名誉,他在讲话中指出:“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用非常粗暴的方法禁止它存在、发展、传授,无论从科学的、政治的观点来说都是错误的”,并表示愿意尽力支持社会学学科的发展。①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

* 本文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得到陆学艺、杨雅彬、王育民、宋家鼎、刘英、单光鼐、徐鸿宾等同志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通讯》1979年第24期。

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也比外国落后了。对社会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①在此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委托费孝通教授召集过去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举行过若干次座谈会，征求开展社会学研究的意见。经过酝酿和准备，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于1979年3月宣告成立，费孝通教授被选为会长，雷洁琼、杜任之等被选为副会长。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开始。

从1979年到现在，我国社会学事业的发展在短暂的十年重建过程中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中国的社会科学舞台：

第一阶段（1979—1982）。这一阶段是社会学的初创阶段。重建之初，创业者们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难题：由于从1952年起社会学系便不再招生，1953年取消了最后两个社会学系，无论是专业研究人员还是教材，都形成了长达二十几年的空白。旧中国培养的社会学工作者在“反右斗争”和十年内乱中历经磨难，自身存在着年龄大与知识老化的问题。正如费孝通教授在当时指出的那样：“怎样创建新中国的社会学呢？首先要有人，这在当前是个大问题。”^②特殊的难题需要用特殊的措施来解决。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采取了一系列打破常规的方法造就社会学队伍：动员过去从事社会学教研工作的同志归队；1980年和1981年，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等单位连续举办了为期一年的社会学专业训练；打破高校未办过研究生班的惯例，在南开大学开办社会学研究生班；在北京、上海、长春、武汉等地举办各种专题的社会学讲习班。以培养社会学人才为中心的重建工作推动了我国社会学事业的全面发展。1979年8月，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筹备组成立，1980年1月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正式成立。1979年，上海市社科院社会学所筹备组成立。到1982年5月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年会召开时，全国已有7个省市建立了社会学学会；7个省市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机构；南开大学设立了社会学专业；复旦大学分校、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设立了社会学系；社会学研究在全国各地逐步开展，社会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和书刊出版工作已经开始。1982年中国社会学学会在武汉召开了第一次年会，总结了前段的工作，讨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学的方针和计划。这一阶段的工作为日后社会学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阶段（1983—1985）。1983年4月，全国社会学“六五”规划会议在成都召开，这是我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的第一次规划会议，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把社会学研究的课题纳入国家规划。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社会学学科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呈现出的特点有：（1）规模较大、系统性较强的社会学研究开始着手进行，“江苏省小城镇研究”、“我国城市家庭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五城市家庭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研究”、“全国青工现状、青农现状调查”、“劳动就业”和“犯罪研究”等课题被列入“六五”规划，这些课题研究的开展，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学事业的发展。（2）社会学研究的层次和范围在迅速增多和扩大。全国各地的社会学教研单位和社会学工作者，根据本地区的特点，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和社会学研究。研究的领域扩展到社会学的许多分支学科。（3）社会

① 参见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67页。

② 费孝通：《积极创建新中国的社会学》，《社会学通讯》1981年第1期。

学队伍在迅速扩大。到1985年底,全国已有21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或社会学学会,有12所大学设立了社会学系和专业,社会学专门教研人员已达到900多人。(4)社会学的普及工作迅速发展,社会学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5)社会学研究同经济体制改革等社会现实的结合更为密切。“六五”规划社会学重点课题研究的开展,各地社会学学会和研究单位横向联系召开的各种研讨会,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等单位在南宁联合召开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变迁”学术讨论会,各地社会学工作者结合本地实际进行的研究,初步显示了社会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功能,引起了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经过这一阶段,费孝通教授在社会学重建之初提到过的学科建立必须具备的“五脏六腑(五脏指学科必须有的五个部门:学会、专业研究机构、学系、图书资料中心、出版;六腑指社会学系必须有的六门基本课程:概论、社会调查、社会心理学、城乡社会学、比较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理论介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育,中国社会学事业全面发展的态势业已形成。按费孝通教授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学的“戏台已经搭好,班子已初步组成”。^①

第三阶段(1986—)1985年12月国家教委在广东召开了社会学专业教改研讨会,1986年4月中国社会学会在北京召开了常务理事扩大会议,1986年9月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等单位在内蒙古召开了全国社会学工作会议。社会学教学系统、学会系统和研究系统相继召开的这三次会议,对前段我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进行总结,对我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价。在充分肯定前段社会学发展的成绩的同时,来自各方面的社会学工作者也看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看到了社会学发展状况同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的差距。对社会学重建历程的回顾和对社会学发展前景展望,使人们意识到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提高和向纵深发展的艰巨任务。从这三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看,中国社会学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全面建设,发展提高的阶段。1986年10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社会学学科规划小组确定了“七五”期间社会学学科的首批13个国家重点课题,选题涉及到的内容和难度也充分印证了这点。这一阶段初步显现出的特点有以下几个:(1)社会学界出现了一种反思的气氛,人们认识到无论是从社会变革的需要,还是从学科发展的需要,切实提高社会学研究的水平都成为当务之急,从而对学科建设的具体任务和途径进行了较有深度的探讨;(2)各个层次、各种形式的社会学研究的深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3)在社会学学科的基础建设方面和对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方面有所加强。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的社会学在时代和自身发展双重要求的推动下,开始了自己新的、更高的追求。

在短暂的十年里,我国的社会学事业能够健康迅速、顺理成章地从初创阶段迈入全面建设、发展提高的阶段,同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紧密相关:

——正确的重建方针。重建之初,费孝通等创业者们提出了建立一门“在本质上有别于中国旧时代的社会学和西方各国的社会学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②的重建方针。1985年11月,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何建章同志在“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变迁”学术讨论会上指出,要在深入研究改革提出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中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正是由于这一方针贯穿十年

^① 费孝通:《重建社会学的又一阶段》,《社会研究》(北大社会学系),1987年第2期。

^② 费孝通:《建立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社会学纪程》,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1页。

重建过程的始终，有效地保证了我国社会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变革浪潮的推动、思想解放和全面改革既为社会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也以自身对社会学的需求造就了社会学发展的动力。

——新老社会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不但为社会学的重建大声疾呼，对社会学的发展方向、方针和方法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而且通过培养人材和开展研究的不懈努力，为社会学的重建奠定了基础。从哲学、经济学等学科转移到社会学领域中的中年社会学工作者，活跃在全国各地的社会学战线上，在重建社会学的过程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在重建过程中陆续培养出的青年社会学工作者，在实践中业务素质不断提高，以新的风貌在中国的社会学舞台上显露头角，为社会学的发展增添了活力，情势喜人。

——得当的方法。在社会学重建过程中，由于采取了一手抓学科建设，一手抓为现实服务的方法，促进了社会学事业的蓬勃发展。社会学的生命力在于为社会服务，实践证明，摒弃闭门造车、坐而论道的学科建设方法，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推动学科建设、培养学科队伍，扩大学科影响，符合学科发展规律和时代对社会学的要求。在学科发展的始初阶段尤其如此。

——引进、交流与借鉴。文化发展的重要机制是交流和选择。在重建过程中，我们对西方、苏联和东欧等国外社会学进行了一些介绍和研究，同国外社会学机构进行了学术交流、比较和借鉴，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产生了积极有益的效果。有些同志一度曾担心，引进西方社会学造成“污染”。实践表明，只要在引进中坚持“以我为主”的方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待各种理论流派和方法，可以收到“他山之石”的“攻玉”之效。

过去的十年，是艰苦创业、辛勤探索的十年。如今，我国的社会学已从一门鲜为人知的学科成长为一门在我国社会生活和社会科学之林中占有相当地位、蓬勃发展的学科。让我们检阅一下十年的成绩：

1. 学会组织和科研机构。截至1988年3月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社会学学会35个，有些市县也建立了社会学学会。另外，许多地方社会学学会还下设了分支研究会（组），研究范围涉及婚姻家庭、城市、农村、经济、工业、民族、文艺、电影、青年和老年等分支学科。全国各省市社科院都成立了社会学所（或研究室）等专业性的社会学研究机构。学会和专门研究机构的建立，为社会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2. 社会学队伍的建设。现在，约有1000多名社会学专业工作者活跃在社会学的科研和教学战线上。另外，有相当数量的受过不同期限、不同形式社会学训练的各类在职人员，在政府部门和其他各条战线上，运用所学的社会学知识，在研究和改造社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 大学学科建设与教学。截至1988年，全国有12所高校经教委批准设立了社会学系（专业）。截至1987年底，全国社会学专业毕业的本科生有177人，在校本科生为916人。许多院校和科研单位都开展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4. 社会学普及工作。目前全国已有半数以上的高校开设了作为公共课的社会学概论或社会学分支学科的概论。各类企事业单位和行政部门的干部培训机构也开设了各种社会学课程，有些机构建立了社会学教研室。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等单位兴办的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两期招生达4万多人。另外，各地举办了许多各种类型的社会学讲习班和

研讨会。有些地方的广播电台举办了社会学广播讲座，使社会学知识在群众中广为普及。

5. 出版工作。1979年到1987年，全国共出版各类社会学书籍400多种，社会学或以社会学为主的丛书10种，社会学杂志从1981年的2份增加为定期杂志6份，不定期刊物10多份，简讯一份，家庭婚姻、青年、老年、社会保障等专类刊物近20份。

6. 研究状况。从1979年到现在，我国社会学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形式不断创新，方法不断完善。社会学工作者对改革中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如小城镇问题、家庭婚姻问题、人口控制问题、青少年问题、物价问题、社会发展问题、社会结构问题、城市发展问题、农村改革问题、边区开发问题、改革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问题、老年问题、生活方式和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等，已经或正在取得重要的成果，为各级政府的决策提供了依据和参考，显示了社会学的社会功能。在理论建设方面，社会学工作者对社会学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任务、社会学学科体系、社会学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及其他学科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发展规律、社会学研究方法和技术等问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促进了社会学的自身建设。社会学工作者对国外社会学的介绍和研究，为我们了解和借鉴国外社会学的成就和经验做了重要的工作。研究成果的数量可以从一个角度反映出研究的发展状况，以公开发表的社会学文章为例，1979年至1981年的三年中，文章数量为308篇；1985年至1987年的三年中，文章数量为1315篇，比前期增加了3.27倍。^①近年来我国社会学工作者在设计研究课题、组织课题研究、参与社会变革以及对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应用与创新等方面都表现长足的进展，成果质量确有提高。基础理论、主干学科的加强和分支学科的茁壮成长，使社会学事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更加意味深长的是，我国社会学领域中一种基础研究同应用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同经验研究相结合，多层次、多向度研究相结合的态势正在形成，表露出社会学事业向纵深发展，向成熟迈进的良好征兆。

社会学的功过应由社会评说，社会学发展的成就应由它自身产生的社会效益来体现。十年重建，使社会学的影响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社会学研究受到各级党政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的重视，社会学研究的成果被引入决策过程。例如，费孝通主持的小城镇研究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称赞，研究所提供的分析、建议和资料成为实际工作部门制定小城镇建设方针的重要依据；天津市政府从1985年开始同天津社科院社会学所共同开展“千户调查”，将社会学研究中获取的社会情报信息及时反馈于政府决策系统，将社会学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实际工作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上海市社会学工作者为制定上海市文化发展战略进行的调查研究；陕西、甘肃等省社会学工作者进行的“西北贫困地区社会结构研究”等，为正确认识当地实际情况提供了帮助。各地的社会学工作者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同政府部门相结合开展的社会学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所进行的综合研究为正确认识当地社会发展状况、制定社会发展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他们所进行的各类专项研究的成果不同程度地被实际工作部门吸收和采纳，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具体对策。

——社会学研究的发展和社会学知识的普及，对提高政府部门对社会发展的重视程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政府部门中的社会研究部门相继建立，国家计委设立了社会发展局，国家

^① 这一数字是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周贵华根据《全国报刊索引》统计出的结果，内部刊物及其他形式发表的社会学文章未列入统计范围。

统计局设立了社会司，国家科协成立了“社会发展与科技对策研究会”，国务院民政部先后设立了“社会福利和社会进步研究所”和“社会工作和社区服务研究中心”，国务院所属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发展研究所也分别建立了同社会学相关的研究室。另外，政府部门主动向社会学研究机构进行咨询或寻求配合的情况逐渐增多，例如：深圳、厦门、常州等市在制定社会发展战略时都主动邀请社会学工作者共同参与。

——社会学知识受到行政、企业管理者的欢迎。我国许多机关团体和企业的管理者们在实践中认识到了社会学的价值，学习社会学知识的人数越来越多，许多单位在应用社会学知识进行组织管理和改革、调动职工积极性、调整企业内部、外部关系后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许多部门的调查研究人员接受了社会学训练后大大提高了调研水平。

——社会学成为发展边缘学科的基础和综合性研究的骨干。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被引入经济学、法学、哲学、城市规划等学科的研究领域，其他学科的教研人员对社会学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和热情。

——社会学知识在群众中得到普及。社会学知识作为公民应当具备的常识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1981年，有人在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过一次调查，调查表明，在179名被调查的大学生中，仅有65%的人知道有社会学这门学科，而大致了解社会学研究内容的仅占25%。这种情况同几年后社会学普及读物成为畅销书，人们踊跃参加各类社会学教学活动，“社会化”、“角色”和“社区”等社会学术语成为人们日常用语，社会上形成一股规模不小的“社会学热”的今天成为鲜明的对照。社会学知识的普及不仅为社会学的发展造就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纵观十年变迁，俯瞰当今现状，一个结论可跃然纸上：过去的十年是社会学健康成长的十年。尽管在重建过程中存在或多或少的不足与争论，尽管社会学发展状况同社会需要还存在一定差距，但是，在社会各界关怀和支持下，社会学工作者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铸就了一个无可改变的事实：社会学在中国社会科学之林中争得了自己的地位，在中国社会生活的沃土中植下了深根，为自身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过去，社会学一度被视为“可有可无”的学科、“资产阶级伪科学”、“研究其他学科不研究的问题”的学科；而今，社会学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社会学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特有的作用这一观念，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领悟。为此，我们社会学工作者应当感到自豪，但更应从这种变化中体会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的任重道远。在新的基点上按照时代的要求和学科发展的客观规律进一步繁荣我国的社会学事业，仍然需要我们长期不懈地努力和奋斗。

前景展望：社会变革呼唤着社会学的发展和创造

1979年起步的经济体制改革，如今已发展成为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教育科技体制改革在内的社会体制全面变革。变革造就的事实和变革追求的目标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中国正处在一个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化的关键阶段，在改革开放的前提下建设现代化，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

中国社会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将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进行。

变革的时代为社会学的发展造就了良好的条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多次指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由某种社会需要决定：社会一旦有某种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千所大

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社会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剧变的社会往往给社会学提供跃进的时机，社会的重大变革总是把灵感和推动力同时赋予社会学这门学科。

变革的时代也对社会学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当新旧体制的转换使社会的运行机制、社会形态，乃至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都发生相应的变化时，社会期待着声称“从总体上研究社会”的社会学对现实和未来提出自己的理解、描述和预测，提出对现实有所作为的理论与对策。

能否利用时代赋予的机会，能否在新历史下实现社会学的社会功能，关系着社会学的命运和前景。应当清楚地看到，尽管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的社会学事业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同时时代的要求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差距的扩大则意味着危机的来临。对此，我们的选择只能是发展和创新，在回答变革提出的新问题的同时加强学科建设，开拓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新路。我们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对于促进我国社会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或许有一定的作用：

第一，加强对具有战略决策意义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社会学事业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之所以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关注，同社会学工作者开展对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提出有效的社会对策有一定关系。但是，由于学科的不成熟、理论的不完善和队伍的不健全，我们对许多重大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显得力不从心，处于没有发言权或发言权不足的境地。尤其是对于改革中提出的新要求和出现的新现象，如改革的社会制约因素、社会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思和方案、社会结构的新变动以及法制和民主建设、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各个层次社会变迁的相关性以及城乡改革中的若干重大问题等，缺乏综合、系统的研究。尽管我们对上述某些问题有所触及，但研究水平很难说高于其他学科，社会学的特色和优势尚未充分显现。

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社会学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还缺乏在浩如烟海、扑朔迷离的社会现象中抓尖锐问题、敏感问题和关键问题的洞察力和魄力。我们听到过这样的议论，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丧失了三次可以使社会学扩大社会影响，大步前进的机会：第一次是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新联合形式的研究，第二次是对新技术革命对社会影响的研究，第三次是对城市改革起步的研究。由于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没有抓住时机，拿出社会所期待的成果，结果使社会学在变幻多姿的社会现实面前失去了大显身手，为学科建设创造有利条件，从而产生突破和创新的良机。

其次，在我们当中，一些同志片面理解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把战线拉得过长，把所有与社会学有关的课题全部网罗进来，主次不分，甚至主次颠倒，把有限的力量不切实际地分散使用，一些同志陷入微观的研究，而且越分越细。这与一些同志怕担风险、微观研究短平快容易见效以及出版部门对利润的追求的导向作用等问题有关。

再次，对各种研究力量协调不力，对课题组织技术的欠缺，使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处于一种分散的状态，也形成了对研究重大现实问题的制约。

我们认为，十年来社会学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摒弃无所作为的思想，思想再解放一点，社会学要参与社会变革，干预社会生活，大胆地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途径，以社会学独具的特色不断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以实际行动争取社会学的发言权，争取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突破。

第二，要强调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密切联系中国实际的、为中国社会变革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社会学。

尽管存在着一种适应各种社会和国家的社会学一般理论，但这种一般理论的应用与发展却离不开各个社会的具体情况。扎根本土才有生命力，这是社会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二次大战之后社会学的中心由欧洲转移到美国，这是伴随资本主义世界中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崛起而出现的现象，同时也是美国的社会学突出了自己的特点、扎根于美国的结果。同样，社会学只有扎根于中国的土壤，突出中国的特色，才能够得到发展，才能打出中国、走向世界。

十年来，我们大量翻译出版了国外社会学书籍、论文，对社会学的发展史、社会学的理论、流派尤其是当代美国、日本及欧洲各国的社会学状况进行了普及和传播。这在社会学重建阶段是十分必要的，即使是在今后我们还是要不断引进，在借鉴与比较中推进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在引进的过程中鉴别、消化、吸收的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努力，在引进国外社会学的过程中难以突出主体性的问题有待改进。引进与发展不平衡恰恰证明了我们应该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立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

我们曾经将学科的发展方针描述为“重视理论研究，加强实际研究”，现在看来这个提法还是具有实际意义的，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实际研究都必须面对中国的实际，了解中国国情。今后我们还要花大气力，深入细致地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社会学在中国中断的20多年恰恰是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剧烈动荡中社会学迅猛发展的重要时期，社会学在社会变迁中获得了发展动力与条件。今天中国也处在激烈的变革时期，社会学的发展遇到了十分有利的机会，需要我们研究的大量新问题不断地涌现出来，比如社会发展的新目标、所有制结构的新变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态势、城乡关系的新格局、各类社会组织的新秩序、社会利益的新分化、民族精神的新解放等，这些现象的出现以往是不可想象的，这里有大量宏观的微观的问题有待于我们去研究。

应当看到，我们对这些新现象的滞后研究较多，而同步和超前研究较少。这样一来，无论是在发挥社会学的社会功能以指导社会实践，还是在从社会现实中汲取学科发展的灵感和养料方面，都显得缺乏生气。长此以往，社会学发展的势头和活力将降低，社会学的社会地位也要下降。要高瞻远瞩地搞好同步和超前研究需要勇气，但是勇气是需要以科学的态度、透彻深入地了解中国的现实把握中国的实际和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为基础的。所有有志于社会学研究的同志都应该放下架子，到实践中去，到人民群众中去，踏踏实实地搞好调查研究，将中国社会学事业之根深深地植于中国的沃土之中。

第三，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社会学科研、教学工作者的素质。

十年来，我们已经建立起一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队伍，但是社会学在全国的发展极不平衡，在经济、社会较发达地区与相对落后地区之间，在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即使是在较发达地区内部的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社会学的普及与发展水平也是存在较大差距的。此外，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发展也存在不平衡的现象。

抓紧抓好队伍建设仍然是我们今后的奋斗目标之一，队伍建设主要从普及与提高两个方面入手，社会学热在我国已经形成，还在发展，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已经培养出2万多名学生，第二届学员总数也将近2万。已经毕业的学生在社会学研究中初步显示了才能，一些城市、地区甚至县里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机构，大都是以这届毕业生为骨干组织起来的。应该指出的是，各省市的社会学研究所，大专院校的教师在创办社会学函授大学的过程中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普及社会学的工作还要继续努力，同时不断提高社会学研究工作者的素质已经

成为关系到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大问题。

我们这支队伍大致由三方面人员构成：一是解放前从事社会学研究或学习的老专家、老同志；二是由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新闻学、文学、外语及自然科学等研究领域转行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中年同志；三是重建社会学后，进入各种学校学习社会学，毕业后又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同志。老同志为重建社会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且为培养中、青年费尽了心血，许多同志至今还活跃在科研第一线。他们也在不断学习，更新知识结构。转行的同志在近几年的研究实践中提高了水平，仍然面临着完善知识结构，开拓新的知识领域的重要任务。一大批青年同志正在成长，逐渐担负起科研主力军的重担，但是社会学在中国还远未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因此，青年同志虽然已经接受过较为系统的社会学理论学习，但是社会学本身还在发展，学习的任务仍是很繁重的。无论是哪一部分同志，都有一个面对中国的改革实际不断提高素质的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了解掌握国外社会学的发展趋势，沟通国内各个方面社会学研究的信息，以及不断端正学风，向实际工作者学习，都是搞好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

在队伍建设过程中，团结协作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团结协作使我们的社会学重建和发展取得了成功，今后我们还要大力提倡团结协作。首先应该强调的是社会学专业队伍内部的合作，无论是老专家老同志，还是中青年，各自都有自己的长处，要取长补短，相互合作。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搞五湖四海的大团结，跨地域跨学科共同促进社会学的发展，我们在谈论十年来的不足与展望今后的发展时都谈到了解放思想、抓大题，社会学要参与社会改革。这样繁重的工作，无论是单纯依靠哪一部分人还是单纯依靠哪一门学科，都是难以胜任的，因此要开展大协作。这也是解决目前战线太长，重复研究太多的方法。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又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穷国，要真正了解中国的国情，没有大协作，只靠目前的1千多人的队伍，是很难完成任务的。此外，我们还要强调搞好专业队伍与非专业队伍、科研人员与民政部门、统计部门、调研部门及行政部门的合作，这样就形成一支数以万计人员组成的社会学研究大军。

第四，要花大力气加强学科建设。

过去的十年尽管创造出学科向纵深、全面发展的态势，但学科内部的比例关系还相当不完善，社会学基础理论和主干分支学科发展不够，而一些次要的分支学科在一些因素的刺激下成为热门。发展各种分支学科，满足社会各方面对社会学的需求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无视社会学基本理论和经济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工作等主干分支学科亟待发展的现状，而热衷于用猎奇和附庸风雅去制造社会学的“繁荣”，那么，这种繁荣将成为日后的危机。当人们把社会学看作是“帮闲学科”和“庸俗化”时，我们将无言以对。因此，按照学科发展的规律，为学科发展制定全面、科学的规划，这是摆在学科建设面前的首要任务。

其次，要提高社会学研究水平，注意发挥社会学的特色和优势，防止“非学科化”倾向的加重。社会学可以成为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和骨干，但这丝毫不意味着社会学本身是各门其他学科拼凑而成的“拼盘”，如果社会学研究同其他学科的研究毫无二致，这门学科也就到了存在的尽头。因此，在研究中不失时机地捕捉社会学理论的“生长点”，丰富社会学的理论，完善和发展社会学特有的分析模式，将研究水平大大提高，对社会学的学科建设至关重要。

再次，要抓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任何学科都离不开理论与方法，而理论构架的

形成也离不开方法的研究与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区别于其它学科的主要内容之一。二次大战之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与社会学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计算机的运用，数理统计方法的运用，对社会学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其它学科相比，这一点是社会学的长处之一，它使社会现象成为可以量化、可以操作的研究对象。这个社会学发展的关键时期，恰恰是我们中断社会学研究的20多年。十年来，我们也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一些大型的调查往往要进行上万、甚至五六万人的抽样，动辄需要几十万几万元，成立数十人数百人的调查队伍。但是在对一些调查结果进行研究时，在资料处理和分析方面显得无能为力，得出的结果同研究的规模不成比例，得出的结论同实际相距甚远。一些同志说，我们引进了调查方法，但是只学到了一些皮毛的东西，这话不无道理。在开展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量化研究缺乏系统化科学化，在调查之前没有很好地论证，大量的问卷设计方案及问题设置缺乏针对性和严密性，调查结果又不进行科学的验证，得出的结论难以推断预测。且多方重复调查，缺乏彼此联系，调查结果利用不充分，造成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

为了更有效地开展社会调查，我们应该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请国内外专家，办调查方法讲习班、召开研究方法学术讨论会，开展跨地域跨学科协作攻关，同时着手建立数据库。彻底改变目前一部分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同志对计算机、数理统计方法一窍不通或一知半解的状况，逐步达到不懂得这些社会学调查方法不能成为社会学专业研究人员的高技术高水平的要求。

社会学自身建设要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还必须统筹发展，对理论、方法、历史、现状等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研究。例如社会学史、社会思想史等都可以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研究内容。此外，还应该强调一下，青少年研究是我国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和特色，近年来，已经从青少年问题研究进入到青少年的全面发展、青少年立法等研究领域。青少年研究已经比较深入，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和一支很强的研究队伍。存在问题与整个社会学的发展状况关系密切，因此不再赘述。

第五，要为社会学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社会学虽然经过十年的重建与发展，但是仍然有许多领域有待于我们去探索和开拓。即使是已经比较成熟的西方社会学从创建至今也不过150多年，社会学是个年轻的学科，还需要进一步发展。要使中国社会学取得较快的进展，首先需要有一个有利于社会学发展的客观环境，有利于充分调动社会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感到精神愉快，思想活跃，没有压抑的活泼健康的政治环境，真正建立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空气。社会学自身的完善也是十分重要的，要克服狭隘的门户之见，把全部身心用在社会学的发展上来。如果在将来中国出现几个能够跻身于世界的社会学学派或是若干为国内外人士仰慕的著名专家、学者，那将是中国社会学界的光荣。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解决好社会学自身建设与改革开放建设四化的关系，抓大题、参与社会改革是社会学发展的关键；抓好队伍建设，协调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努力提高社会学工作者的素质是社会学发展的基础；团结协作，共同奋斗是建立中国社会学的保障。放眼未来，齐心协力，共同奋斗，我们就可以取得比以往十年所取得的更加辉煌的成就。

1988年7月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